

暨南大學叢書

中国古代史论集

(第二集)

汤开建 马明达 主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暨南史学丛书

中国古代史论集

(第二集)

汤开建 马明达 主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史论集.第2集/汤开建,马明达主编.
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.6
(暨南史学丛书)
ISBN 7-5325-4449-4

I. 中... II. ①汤...②马...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
文集 IV. K220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4436 号

暨南史学丛书

中国古代史论集(第二集)

汤开建 马明达 主编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314,000

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,800

ISBN 7-5325-4449-4

K·875 定价: 39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前与承印公司联系

总 序

广东属禹域极南之地,自昔为海上交通枢纽。汉代合浦徐闻即为往印度洋航路出口障塞,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之详矣。暨南大学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),取《禹贡》“朔南暨,声教訖于四海”为名,用意至深。故魁然为侨校之首。创校以来,一贯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、传播世界先进文化为职志,于推动历史研究,更不遗余力,早在1928年即有历史学系之创设。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执教之名历史家先后崛起岭表,何炳松之于史学理论,周予同之于经学史,丁山之于商周史,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,均树立风声,为暨大史学奠定扎实研究基础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由于国家教学重点之扶持,史学队伍更为坚强活跃,陈序经、陈乐素、朱杰勤、金应熙辈,于宋史探索之深入,东南亚史、华侨史、港澳研究诸领域之开拓,蔚为重镇,于史学界中更别开生面。

近时暨大计划出版一系列“暨南史学丛书”,除刊布专著,并辑录近几年来暨大学人在国内外发表有代表性之论文,系中同仁来书要我写一序言。暨大在史学园地的成就,因地缘关系,特别朝向中外与港澳之关联及岭南人文活动等主题,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,自有它的特色与传统。至于新的课题,若“南海神庙之历史”及“阿剌伯人与南海船”等专门研究,尚待推进,为岭南文化史填

补缺口,正是大家迫切期待的工作。港澳地区之历史学由于暨大史学研究工作成果之带动,彼此之间唇齿相依,更能产生重大促进作用,自不待言。因不辞龃陋,欣然而乐为之序。

饶宗颐

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

前 言

一直以来,中国古代史是暨南大学历史学科研究的重点之一,这是传统,也是受到学校重视的学术创新区。近些年来,在我校古籍所、历史系所有新老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,以博士点为龙头,中国古代史的科研、教学队伍和学术结构都有了长足发展,渐渐形成新的格局,特点亦趋于显明。第一,强化了明清史研究,特别以明清中外关系、社会经济及澳门历史文化为重心,队伍齐整,成果累累,整体水平已为海内外学界所认同,其中尤以澳门史的研究为中外学人所期许。在明清史的不同方向上,一些中青年学者正在锐意探研,表现出很好的学术进取精神,这增强了我们对暨大明清史发展前景的信心。第二是辽夏金元史研究。辽夏金元史原不是暨南史学的传统,但随着近些年有新人源源入列,专业力量得到充实,初步汇集成了一支队伍,且具有新老搭配,起点高、后劲足的优点。以目前状况言,应承认我们这支队伍尚乏群体性筹谋与成就,个人学术趋向相对分散,也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学术依托点。但通过我们进一步的积累和整合,暨南的辽夏金元史队伍未尝没有异军突起的可能性。第三是巩固并发展唐宋史研究。以陈乐素教授奠基的宋史研究,近年来又有所拓展,形成了以研究唐宋史及文献为重点的新格局,研究方向包括唐宋政治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、社会

史及相关历史文献。

中国古代史是领域宽广的史学园地,除了若干传统分支学科外,还有着巨大的创新空间,有不断增设交叉学科的必要性与迫切性。暨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,特别是一所以侨校为基本特点的高等学府,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教学上都应该更具创新精神,以求学术上不断有所拓展,不断有新的思路和建树。在这方面,暨南大学的史学先贤们事迹昭彰,含弘光大,我辈当奋力跟进,在探索中更化求善,承先启后,以无负于百年校史所精蕴的学术精神,无负于“忠信笃敬”的煌煌校训。在当前,当学术造假的恶浪已经进入暨南校园之际,愤慨抵制之余,我们尤其要以高尚的学术品格和责任心来把握自己,在虚华与功利面前要多一点定力,多一点片石孤峰、清池皓月之心,坚守“博学于文,行己有耻”的古训,孜孜追求暨南史学的复兴与光大!

主编

二〇〇六年六月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1
论广东先秦秦汉的航运·····	赵善德 1
唐代东都分司官任职原因分析·····	勾利军 18
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、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之关系 ···	范立舟 30
陈瓘与《四明尊尧集》 ——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的 考察·····	张其凡 金 强 48
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·····	屈文军 68
钦察、阿速、斡罗思在元朝的活动·····	马建春 81
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 ·····	马明达 113
杨完者与苗、僚武装 ·····	王 颀 166
元代史籍所载羊肉的食用和食疗 ·····	陈广恩 188
试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·····	李龙潜 207
万历四十八年红夷船沉阳江始末考 ——兼谈红夷大炮早期入华问题 ·····	汤开建 238

关于 16—17 世纪初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西方文献 …	张廷茂	273
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构的形成与演变 ……………	叶 农	297
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 ……………	徐 林	321
明清时期医学用糖演变初探 ……………	周正庆	332
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围海造田与生态环境的 变迁 ……………	冼剑民 王丽娃	346
清代移民与台湾食盐贸易制度化 ……………	刘正刚	359
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 ……………	陈文源	373
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——白鸽票考述 ……………	赵利峰	394

论广东先秦秦汉的航运

赵善德

内容提要：本文利用详尽的文献和考古资料，结合中国航运发展的大背景，论述广东地区先秦秦汉时期的航运史实，提出：约距今 6000 年前后，广东地区已有独木舟，稍晚则使用“双架艇”航行于南中国海沿岸；战国时应已利用“双身船”航至南太平洋岛屿。秦时已可造 25 至 30 吨的木船，沿海岸航行，求取“珍怪”。南越国时已可制造高十余丈的河船、海船；而民众在日常生产中则较广泛地使用各种木船，这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。西汉晚期，航运有过短暂的式微。东汉时期，既有使用舵、橹和风帆的数层楼船航行于河、海，还有较之简便的各种中、小木船，普遍使用于日常生产。

关键词：先秦秦汉 广东 航运 独木舟 双身船 楼船

以往研究广东地区航运的论著，或者较少涉及先秦，这就使秦汉的研究结论缺乏基础；或者较少将史籍与考古文献紧密结合；或者较少将中国航运发展的大背景同广东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。因此，有结论不太详细和证据不很坚实之嫌。本文希望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推进。

一、先秦时期的航运

距今 6500—5000 年间,主要分布在今珠江口岛屿和沿岸的咸头岭文化,^①虽然没有与木船有关的遗存被发现,但是第一,其先民可能是由五岭南麓顺水南迁的;^②第二,该文化许多遗址的分布是隔着辽阔水域的,但遗存一致,当有航运交往;第三,居住在太平洋海域岛屿上的波利尼西亚人,在和欧洲人接触以前用石器和贝壳加工木材,制作独木舟,可为旁证;^③第四,约距今 7000 年前后,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的河姆渡文化,出土有木桨,^④有桨就有船,亦是旁证。综合之可认为,当时的“越人”或已使用“双架艇”^⑤沿海航行。

稍晚的石峡文化,所出的陶鬻形制接近于良渚文化的风格,两个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。^⑥ 1984 年广东海丰出土的玉琮,其质地

① 杨耀林:《深圳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年代分期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》,载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1994 年;李松生:《试论咸头岭文化》,载《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,1994 年;邓聪等:《大湾文化试论》,载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1994 年。

② 赵善德:《论珠江三角洲的先民迁五岭南麓》,载《广东史志》2001 年第 3 期。

③ (前苏联)C. H. 托尔斯托夫等主编,周为铮等译:《普通民族学概论》,第 84—85 页,科学出版社,1960 年;(英)雷蒙德·弗思著,费孝通译:《人文类型》,第 51 页,商务印书馆,1991 年。

④ 浙江省文管会等:《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》,载《考古学报》1978 年第 1 期。

⑤ “一只独木舟一侧绑扎一木架,即成单架艇,两侧加木架为双架艇。任何小船加上单架或双架,在海上航行虽遇风浪,不至倾覆。”参阅凌纯声、凌曼立:《树皮布印纹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》,第一、八章,台湾“中研院”民族研究所,1963 年。

⑥ 黎家芳:《石峡与东南沿海原始文化的关系》,载《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卅周年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88 年。

和纹饰均与良渚文化的相似。^①而石峡文化共出土有6件同样的玉琮,据此有学者更进一步说,这种交往的路线当以海道为主。^②

先秦的有段石铈,除了分布于我国的东南沿海之外,还包括云贵高原、台湾、菲律宾附近岛屿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。它应是大陆发生,然后传于海岛的。^③

曾骥先生充分研究了广东西樵山的石器后说:“就西樵山文化本身而言,由于它的外向型特征和它所处的位置,这个文化已超出了今天的国界,成为环太平洋文化的一员。”^④

具体到春秋战国时期,史籍即有丰富的有关记载。

《韩诗外传》载,周成王时,越裳(今越南北部)献白雉于周公。并言之凿凿来于海路:“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,海不溢波也,三年于兹矣,意者中国殆有圣人,盍往朝之。”《尚书》亦有相同记载;^⑤《汉书·王莽传》也有提及,当可信。

《左传·哀公十年》:“(吴大夫)徐承帅舟师,将自海入齐,齐人败之,吴师乃还。”^⑥说的是公元前485年,吴国派遣海军由海上进攻齐国,但未入境,即为齐军击退。这当是一场海战。《史记》吴世家、齐世家也有记载,可信。

① 毛衣明:《海丰县田墘圩发现新石器时代玉器》,《中国考古学年鉴》1985年卷,第202页,文物出版社,1985年。图见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:《广东文物普查成果图录》第23—24页,图24,A、B。

② 吴汝祚:《试论石峡文化与海岱、太湖史前文化区的关系》,载《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卅周年文集》。

③ 林惠祥:《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:有段石铈》,载《考古学报》1958年第3期。

④ 曾骥:《西樵山的开发和西樵山文化的外向型特征》,载《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91年。

⑤ 转引蒙文通:《越史丛考·越裳为越章辨》,第26页,人民出版社,1983年。

⑥ 《春秋左传集解》,第1766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7年。

实际上,当时吴国海军的装备已经颇具规模了。如《越绝书》所云:

阖闾见子胥,问船备何如?对曰:船名大翼、小翼、突冒、楼船、桥船。令船军之教,比陵军(按即陆军)之法。大翼者,当陵军之重车;小翼者,当陵军之轻车;突冒者,当陵军之冲车;楼船者,当陵军之楼车;桥船者,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。

章巽先生分析了众多史籍后认为,战国时代沿海交通线上的重要港口颇多,而东瓯、冶、番禺等各族越人的都邑也都是比较重要的港口。^①并进一步推论说,《周礼·春官》中所说的“以十二风察天地之和”,实际记述着人们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,即对一年中季风的变化有了较准确的认识。^②

史籍中虽然没有关于此时期广东航运方面的具体记载,但考古所获的文化遗物却很丰富。例如:

博罗园洲的一座春秋龙窑所出产的印纹陶罐和原始瓷豆,是其典型产品。^③目前得知,这种产品非但见于东江流域的冲积平原一带,而且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、^④深圳的叠石山、^⑤大梅沙^⑥和鹤地山、九祥山、铁公坑等遗址^⑦也均有出土。在珠海,不但是

① 章巽:《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》,第8页,商务印书馆,1986年。

② 《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》,第9页。

③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《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掘》,载《考古》1998年第7期。

④ 彩图见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编制:《香港文物》,第13页。

⑤ 深圳市博物馆:《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》,载《文物》1990年第11期。

⑥ 深圳市博物馆:《深圳市大梅沙遗址发掘简报》,载《文物》1993年第11期。

⑦ 三处遗址的材料见,杨耀林等:《深圳市先秦遗址调查和试掘》,载《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,1994年。

现为大陆的金鼎外沙、^①沙煲地^②和鸡山^③遗址有所发现,而且在
外伶仃岛的石涌湾,^④也发现它们的残片。

这说明惠阳平原当时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,
而且极有可能是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。

铜鼓仅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各国,以中国的云南、贵州、
广西、广东、四川南部、湖南西部,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偏北一带,
为分布最稠密的地区。老挝、柬埔寨、泰国、缅甸、马来西亚、印度
尼西亚都只有零星的发现。云南楚雄万家坝 23 号墓出有 4 件铜
鼓,^⑤该墓的碳-14 测年为距今 2640 ± 90 年;而从铜鼓发展的序
列来看,祥云大波那出土的一件铜鼓比万家坝的更原始,因此更原
始的铜鼓还应更早。^⑥虽然某些地区铜鼓沿用到清代的道光年
间,甚至 20 世纪初,但早期铜鼓的分布和年代^⑦与一种不对称形
铜钺^⑧大体一致。即往北可到四川南部及贵州西北部,南面越海
除爪哇岛外还达苏门答腊岛、巴厘岛、苏拉威西岛、卡伊岛等地。
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,即公元前 5 世纪至前 1 世纪。

梁钊韬先生认为,罗泊湾铜鼓上的双身船纹中所见的双身船
也就是南太平洋岛屿民族在大海大江航行的“双独木舟”(Double

① 李子文:《金鼎镇外沙遗址调查》,载《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1 年。

② 赵善德:《南屏镇白沙坑、沙煲地遗址调查》,载《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》。

③ 李子文:《唐家镇大坞环、鸡山遗址调查》,载《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》。

④ 杨少样等:《珠海海岛考古调查》,载《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》。

⑤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:《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》,载《文物》1978 年第 10 期。

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:《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》,载《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82 年。

⑦ 汪宁生:《试论中国古代铜鼓》,载《考古学报》1978 年第 2 期。

⑧ 汪宁生:《试论不对称形铜钺》,载《考古》1985 年第 5 期。

canoes)。而且波利尼西亚人所信仰的水神(Tangaror)与闽越沿海的疍民有关。并且进一步说,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便有我国沿海居民向太平洋诸岛屿迁移。^①

综合之,完全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广东先民,已经利用“双架艇”或“双身船”^②游弋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岛屿。

二、秦与南越国时期的航运

由上述结论可以进一步说,秦统一岭南时“越之犀角、象齿、翡翠、珠玕”^③中的部分“珍怪”应来自海外。而且,秦始皇时徐福“求仙”最终落户日本,不但可信,尚可认为是从琅琊台(今山东藏马)或芝罘(今山东烟台)港口发船,先向东直驶而去,靠近朝鲜半岛后再沿海岸南下,横渡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九州或本州。^④

广州市中山四路的秦汉遗址,或曰造船工场,^⑤或曰建筑遗址,^⑥见仁见智。但估计当时有能力制造载重 25 至 30 吨的木船,^⑦则另当别论。因为下列三组互为增援的资料,是有力的佐证:

其一,建元三年(前 138),“闽越围东瓯;东瓯告急。遣中大夫

① 梁钊韬:《西瓯族源初探》,载《学术研究》1978 年第 1 期。

② 将两艘小船用横台连结在一起,成为一艘大船,类似于今天的“双体快船”。又可参阅《普通民族学概论》第 84—85 页及图 21—23。

③ 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,第 203 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,1989 年。

④ 姚楠等:《七海扬帆》,第 23—25 页,中华书局(香港),1990 年。

⑤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等:《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》,《文物》1977 年 4 期。

⑥ 参阅徐恒彬:《华南考古论集·“南海丝绸之路”概述》,第 232 页注 7,科学出版社,2001 年。

⑦ 《广州市文物志》,第 50 页,岭南美术出版社,1990 年。

严助持节发会稽兵,浮海救之。未至,闽越走,兵还。”

元朔元年(前128),“东夷秽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,为苍海郡。”服虔注曰:“秽貊在辰韩之北,高句丽沃沮之南,东穷于大海。”

元鼎六年(前111),“秋,东越王馀善反,攻杀汉将吏。遣横海将军韩说、中尉王温舒出会稽,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,击之”。^①

这说明,至汉武帝晚年,西汉王朝制造海船和海军作战能力之强,它完全可能影响到当时的南越国。同时,既然闽越有实力“围东瓯”,南越国的海上航运水平也不可低估。

其二,汉武帝准备征伐南越时,大修昆明池,“治楼船,高十余丈,旗帜加其上,甚壮”,那是因为“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”,^②暗示着南越国的楼船亦如此“甚壮”。

经过准备,汉武帝“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(南越)”。元鼎六年(前111)“冬,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峡,破石门,得粤船粟因推而进,挫粤锋,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”。陷番禺时,“吕嘉、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”。“(伏波)遣人追。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”。^③

南越国之河船、海船装备,果真“甚壮”:既可在内河与汉军抵抗一阵,又可“夜亡入海”,而且汉军的楼船还不一定能入海追之,非其旧部方可。

其三,考古发掘获南越国时的木船模型5件,均出自广州。M1048.87,只存船底及旁板,系由一整段木料凿出;^④东山出土的

① 《汉书·武帝纪》,第158、169、189页,中华书局,1962年。

② 《史记·平准书》,第1436页,中华书局,1959年。

③ 《汉书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》,第3854—3858页。

④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:《广州汉墓》,第177、475页,文物出版社,1981年。

是彩绘楼船,惜未可复原。^①

随葬品从本质上反映了人们的欲望。木船模型并非出于大墓,表明了社会使用船的相对普遍性。进而说明,南越国的造船业已具相当规模。

三、西汉中晚期的航运

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,又于元封二年(前109)“遣楼船将军杨仆、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”。^②三年后的元封五年(前106)“冬,行南巡狩……自浔阳浮江,亲射蛟龙江中,获之。舳舻千里”。^③这次巡幸江海的规模更大。

应当说,汉武帝建元至元封(前140—前105)的35年间,巡幸江海诸事频繁,这是一个高峰。但自此之后,史籍中非但未见与海河有关的巡幸之事,反倒是因为反逆或大旱或冬无冰,以至“罢郡”之事不绝于史。^④例如:始元元年(前86),益州廉头等(西南夷别种名)二十四邑皆反;始元五年(前81),罢儋耳、真番郡;元凤五年(前76),秋,罢象郡,分属郁林、牂牁;甘露二年(前52),夏四月,遣护军都尉禄将兵击珠崖;初元三年(前46),珠崖郡山南县反,博谋群臣。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崖,救民饥馑。乃罢珠崖。

为什么要罢郡呢?《后汉书》载:

武帝末,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,蛮不堪役,遂

① 黄森章:《广州东山西汉木椁墓发掘记》,载《广州文博》1986年第4期。

② 《汉书·武帝纪》,第194页。

③ 《汉书·武帝纪》,第196页。

④ 《汉书》,第155—361页,武、昭、宣、元、成、哀、平帝纪。